

# 《实践哲学》\*节译

Andrew Feenberg \*\*

许尚楸 译 辛斯多 校\*\*\*

## 第一节 马克思和卢卡奇

在这一章节中，我将主要探讨卢卡奇（Lukács）针对早年马克思（Marx）的哲学思想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从而进一步对卢卡奇是如何以他极具独创性的尝试回应马克思早年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思想家将被相当程度上的差异区分开来，然而，通过这种方法将两者进行比较，总会存在使其中一个丧失独特性的风险。因此，我将尽全力避免将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理论人为地同一化。不过，我认为尽管存在这些现实的差异，我们此处所要探讨的内容均在一种特定的哲学学说的范畴内，我将之称为“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这个名称已经被相当多的思想家采用。

当葛兰西（Gramsci）在监狱中撰写他的《狱中札记》之时，他曾使用“实践哲学”的概念含混地指代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解读。葛兰西主张所有的知识均形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而这种知识则基于一种特定类的世界观形成。没有知识和与其相对应的现实存在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葛兰西所称为“绝对历史主义”的阐释在体系架构上与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Hegelian Marxism）、柯尔施（Korsch）、布洛赫（Bloch）、马尔库塞（Marcuse）以及马克思自己早期的理论学说是相类似的。<sup>1</sup>因此将这整个学说思潮称为“实践哲学”并无不当，“实践哲学”所指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一种可以将特定且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其他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区分开的哲学理论。

早年马克思与卢卡奇所采用的方法，与后期基于历史观察和经济理论所建立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采用的路径存在较大差异。马克思于 1843 年和 1844 年构建出一套他意欲作为经济学研究基础的革命哲学的理论。1918 至 1923 年间，卢卡奇阐释了他的革命哲学，

---

\* Andrew Feenberg, *Philosophy of Praxis: 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published by Verso, 2014)

\*\* Andrew Feenberg (1943-),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译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 2013 级法律硕士；校者系康奈尔大学 2013 级法学硕士。

<sup>1</sup> 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绝对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详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 Hoare and G.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417, 465。还可参考 445-6。关于葛兰西对于实践哲学的阐述，可参见 Thomas Nemeth, *Gramsci's Philosophy: A Critical Stud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0)。

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补充。在早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不是通过实证研究而得来的。相反，它们是马克思和卢卡奇在对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演绎出来的，并且他们还通过同样的方法演绎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独具特色的历史概念。“革命”这一概念也是这种演绎的成果之一，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哲学理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方法论角色。

在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作为实践哲学的文本来解释时，我有必要在针对这部著作中论辩中明确立场。在一开始便通过区分不同的文本解释进而明确本书的立场是大有裨益的。本书中，将仅探讨两个相关方面的内容：《手稿》中针对社会性范畴的本体论特征和规范论特征的争论。<sup>2</sup>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并不是《手稿》的文本解释内容本身，而是《手稿》是否是一部实践哲学的理论著作这一实质议题。我将致力于为《手稿》明晰这一定性，或者相反地，只是在已有的传统本体论的框架之下为经济学说的研究提供伦理理论上的补充。

关于社会性范畴的本体论特征，马克思通过将社会性范畴作为本体论概念，推演出“理性”这一新的概念。这种方法体现出早年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与卢卡奇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联。但是，在卢卡奇撰写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马克思的《手稿》一书未能出版面世。事实上，《资本论》才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文本基础，而非马克思的早年理论。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中承认该部著作深受黑格尔哲学理论的影响，但《资本论》将自身定位为独立的非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十分谨慎地限缩了哲学术语的使用范围，尽量避免陷入对哲学问题的探索。但是事实上，从大量的文本证据可以得知《资本论》中有着非常深入的哲学思考。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份手稿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晚年马克思著作之间的关联研究提供了文本补充，但是这些手稿的出版曾经一度被拖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sup>3</sup>文本的缺失加上马克思在

---

\*后面原文均用 Manuscripts 指代“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故也相应译为《手稿》。

<sup>2</sup> 对该争论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文献如下：Ernest Mandel,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Economique de Karl Marx* (Paris: Maspero, 1967);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a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7); 同样有趣的探讨还包括：在 Herbert Marcuse, *Heideggerian Marxism*, ed. R. Wolin and J. Abromeit (Lincoln, NE: University Nebraska Press, 2005), first published in 1932 一书中的 Herbert Marcuse, “New Sourc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文；

<sup>3</sup>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之间关系的重要探讨参考文献如下：Roman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Vienna: Europa Verlag, 1968); Iring Fetscher, “The Young and Old Marx,” in *Marx's Socialism*, S. Avineri, ed. (New York: Lieber Atherton, 1973); Ernest Mandel,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Economique de Karl Marx* (Paris: Maspero, 1967); Hiroshi Uchida, *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这些作者中的大多

《资本论》中所描绘的蓝图似乎为晚年马克思学说的科学主义解释赋予了正当性，对此卢卡奇从辩证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质疑。

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理论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即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联）。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行探索是建立关联的主要途径，其次是依据马克思针对其所熟知的哲学问题所撰写的哲学评论。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评论道：“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是马克思成熟的机械主义理论（instrumentarium）的一部分。”<sup>4</sup>事实上，卢卡奇最早提出并给出解释：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他早年的政治学著作之中，或者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体现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之中。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此重新作出表述：“这一系列居于核心地位的哲学范畴与反复采用的路径均是直接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借鉴而来的。”<sup>5</sup>

卢卡奇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所展现出的方法论探索重构了实践哲学。这种尝试的结果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尽管如此，卢卡奇基于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所作出的推测性论断，后来在马克思当时未能出版的著作中找到了文本印证，这一点仍然是十分了不起的。最重要的是，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理论框架与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十分相似。并且，和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理论一样，卢卡奇在实践哲学领域中提出的哲学批判颇具独创性。这种巧合的产生与人物背景因素相关联，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曾经深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因此，当他试图构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他选择回到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起点——黑格尔的哲学学说。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的代表著作《资本论》扮演了这种关联的中介角色，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由特定人物因素所产生的机缘巧合，并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卢卡奇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分别进行重构的相似性。

## 第二节 二律背反

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命题只能在历史中被解决，这一论断是实践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二律背反”是黑格尔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二律背反”即近代文明社会中主体存在和客体存在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笛卡尔将主体和客体这两大实体进行区分之后，

---

数均认为马克思早期所提出的“异化”概念是《资本论》中“拜物教”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的发展。

<sup>4</sup> Mandel,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Economique*, 172.

<sup>5</sup>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1971), xlv (emphasis omitted). 在第四章中对于这一段评论有十分详尽地阐释。在本文所有脚注中，*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将简称为“HCC”。所有与之相关的引文均是指这一版本，但是 Livingstone 的翻译存在部分修正以达到尽可能地与原文意思一致。

对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认识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割裂。针对主体范畴的一系列理论着重阐释了自由、价值以及政治理念的意义，与之相对应，针对客体范畴的理论阐释了自然界和历史演进中的必然性法则。从黑格尔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把对近代文明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命题进行统筹归类视为自己的哲学任务之一，并且他认为，通过使用包含主客体两种维度的本体辩证概念可以避免这些矛盾命题的产生。

在黑格尔看来，寻求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是一项理论性任务。然而，黑格尔认为这项任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完成，而他认为自己正逢其时。实践哲学理论首先对黑格尔提出的二律背反解决方案所暗含的结论，以及极端历史条件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和卢卡奇均主张，正是因为黑格尔未能设想到近代文明社会中真正极端的变革情形，他才认为君主制和雇佣劳动等历史现象是永恒的必然存在。马克思和卢卡奇认为，哲学思考并不能真正解决二律背反的难题，只有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如果马克思仅仅讨论与道德和政治生活范围内的二律背反命题，他也许能构建一套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论。这套哲学理论可以与传统的本体论兼容，可能被表述为“左派”黑格尔哲学的变种。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将所有的二律背反命题纳入其中，既有与道德和政治领域相关的二律背反命题，也有与认识论与本体论领域相关的二律背反命题。就此，他主张社会变革不仅可以实现个体与社会、道德责任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还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想与存在的统一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这一主张招致了相当多自相矛盾的必然性结论，在对早期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进行阐释时不应当回避这些结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对马克思这一主张所提出了挑战，后面的章节将会对此有进一步的探讨。实践哲学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活动不仅仅与道德和政治领域而是与所有领域存在哲学性关联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本体论 (*ontological*) 主张。根据这种理论观点，人类活动不仅影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特定领域，人类活动甚至可以直接对存在本身产生影响。换言之，这种理论观点之下价值和事实间（即“应然”与“实然”）的二律背反将不复存在。因为，如果人类活动可以直接影响存在本身，那么与价值相对应的不应当是规范性缺失和与人类活动无关的事实存在，而应当是能够最大程度与价值相一致的事实存在。

这种理论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存在本身必须限定在某种特定领域内，在这种特定的领域里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改造客体。如自然这种明显与人类活动无关的领域，相对历史领域来说居于从属地位，在历史这一领域中人类活动往往从根本上影响存在本身。只有客观存在本身依赖于该特定领域而存在的前提下，人类活动才可以构建客观存在。

这种通过人类来理解存在本身的尝试是一种倒置的哲学人类学。虽然马克思、卢卡奇还有法兰克福学派都参照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采用了相类似的方法,但是两者存在差异:后者更着重强调个体性,由此构建出的哲学理论极富道德性暗示和推测性。在实践哲学理论的支持者看来,对于存在本身的解释来说历史是一种“范式性的规则”。<sup>6</sup>

根据实践哲学的理论观点,“客观存在”具有历史性,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实践的客体。由于实践哲学认为客观存在即历史,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那么人类活动也可相应被准用(mutatis mutandis)为存在构成的相关要素。人类活动呈现其一般性的重要意义,从社会存在中抽离出从而影响存在本身。正如卢卡奇所指出,“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将整个客观存在(Wirklichkeit)视为是历史(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那么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活动本身了。”<sup>7</sup>

由于历史由人类活动所构建而成,那么人类与存在之间的本体论关联就是人类活动。历史是本体,人类物种的形成发展在历史本体中占据重要地位,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只有在此领域中才能最终得到解决。马尔库塞在一篇评论《手稿》的早期文章中如此总结道:“人类历史作为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整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他眼中的历史是整个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是通过对客观存在的现有形式不断更新和扬弃这一演进过程。”<sup>8</sup>

本书的重点即探讨这一命题的内涵之所在,这一讨论可以在两大主题下进行。其中一个主体的内容,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异化或者宗教化来探寻社会存在中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如前所述,实践哲学理论主张,通过对社会的“去异化”可以实现所有的客观的“去异化”。这一主张暗含了另一个主题的内容,即针对社会分析的本体论概括和归纳,我将在这一维度之下进行大胆的尝试性探讨,我称为历史哲学的“元批判”是进行这一尝试的主要路径。之后的章节中将会讨论客观自然在实践哲学中所扮演的富有争议性的角色,针对该争议“绝对历史主义”所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本文也将尝试给出具有原创性的回应。作为回应的论证将借鉴出自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晚期作品中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这一理论资源在我看来是实践哲学的终极阐述。在转向讨论“后设批判”这一概念以及它与哲学的“实现”或者“终结”这些理念的关联之前,本文将对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未作出本体论上的贡献这一观点进行简要的探讨。

---

<sup>6</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44页。

<sup>7</sup> 同上,第145页。对于卢卡奇关于实践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讨论,详见 Lucien Goldman, Lukács et Heidegger (Paris: Denoël, 1973), 103-5, and Andre.

<sup>8</sup> Marcuse, “New Sourc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2-3. 参见原始文献1, Herbert.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 在 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Frühe Aufsätze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530-1 中。

### 第三节 本体还是历史

与马尔库塞的异议相一致，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认为将马克思的《手稿》解释为是实践哲学可能是存在问题的。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对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然”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主张《手稿》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唯物主义者的本体论和对绝对历史主义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同样反对将《手稿》解释为是实践哲学著作这一观点。他认为，早期马克思将客观自然与带有社会属性的自然区分开来，并且带有社会属性的自然是通过劳动这一人类活动得以进入历史的范畴。只有在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宏大框架之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才能指导社会的发展。然而，将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理论作为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在这一反对传统中是惯常做法，卢卡奇的理论与早期马克思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此被否定了。

有趣的是，另一个由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创设学派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阿尔都塞学派一致反对早期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理论，他们主张针对科学客观性的浪漫主义式的批评和自然独立存在的观点。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与阿尔都塞学派的哲学解释存在相当程度上无意识的趋同性，他们都强调与实践哲学理论主张相反的自然独立性，认为任何尝试通过历史来解释自然的理论都是唯心主义的理论。本文在此无法进一步详细地考察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但会简述法兰克福学派力图将早期马克思拖出历史主义的泥潭所作的尝试。

哈贝马斯在《知识和人类旨趣》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文本表达是含糊不清的。他认为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马克思理论的现象-逻辑学分支”的产生，这一派理论观点忽略了马克思的自然主义构想和“劳动这一范畴被赋予了作为构建世界的日常活动的意义。”<sup>9</sup>尽管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也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但仅仅在马尔库塞非常早期和非常晚期的作品之中才能找到文本支持。纵观马尔库塞的哲学生涯，他在反对社会范畴的本体论地位这一立场，上与施米特和哈贝马斯十分相近。比如，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同样也指出了马克思的文本表达中的模棱两可之处；他写道：“马克思的整个文本与黑格尔的理性之理念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甚至深入到依据思想和存在的统一来描述人类的个体实现。”<sup>10</sup>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将辩证法与这一本体论基础分离开，如他在其著作中所表述，客观存在的消极性是一种历史条件，并且这种条件不能被实体化为抽象的事态。”<sup>11</sup>

---

<sup>9</sup>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28.

<sup>10</sup>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275.

<sup>11</sup> 同上，第 314 页。

这种阐释也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学说提供了解释，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手稿》中的理论思想。根据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思想的表述，马克思所试图解决的二律背反问题再次以其已经做出了选择的方式出现：自然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历史还是本体。但是，马克思自己如此写道：

作为一种已经成熟发展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是人本主义，并且作为已经成熟发展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也是自然主义。这是化解人类和自然间的对抗的决定性方法。这是解决存在和本质之间、客体化与主体化之间、自由与必然性之间、个体与物种之间冲突与对抗的真正路径。它是历史难题的最终解决方法，它自身就彰显着这一使命。<sup>12</sup>

早年马克思并不会脱离出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并且将其在哲学上的进展表述为异化是一种历史性的范畴而不是本体论上的范畴。他认为所有的本体在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关于存在本身与历史的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历史具有本体论上的重要意义是实践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作为一个实践哲学家，马克思并未在针对社会范畴的本体论解释和历史性解释中作出择一的选择，而是采纳了两者。因此，他最震撼人心的表述，如前文所引用的，或者是下面这句：“社会是人类和自然共同构建的统一体，是自然的真正复兴，是人类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本主义的实现与觉醒。”<sup>13</sup>

#### 第四节 规范性的维度

认为《手稿》是实践哲学的理论著作这一解释，受到了来自伦理观点的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多次提到的“人类的本质”被“异化”所暗含的实质上是伦理理念。马克思应针对资本家异化所带来的不公正给出自己的变革理由。人类作为“物种”的本质必然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还要求创造可以使得社会制度建立在合作与创造力而非通过竞争来产生的一系列条件。这种表述实质上是对价值与事实的二律背反的概括，即资本主义事实与社会主义价值的对抗。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有些学者认为，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做的尝试是寻求价值与事实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基于《手稿》的论辩当然地会涉及到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宏大论辩。<sup>14</sup>作为实践哲学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

<sup>12</sup>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and ed. T.B. Bottomore (London: C.A. Watts, 1963), 155.

<sup>13</sup> 同上，第 157 页。这本书中，因为很多其他早期马克思的段落在本文有所引用，为了清晰和明确此处便不再使用斜体。

<sup>14</sup> 将马克思的《手稿》看作是伦理学著作的诸多哲学家中，尤金·卡门卡 (Eugene Kamenka) 是重要代表之一。可参见其著作： *Marxism and Eth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69). 伯特·奥尔曼 (Bertell Ollman) 对

无疑是具有规范性的，但本文主张，这种规范性并不是建立在伦理学概念之上的。

本文认为，应首先考察马克思理论中的辩证法特征，以及该理论与黑格尔学说的关联。如果马克思采取了价值和事实与伦理学和社会事实的二分法，他将会像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一样，后退到黑格尔之前的空想教条主义的(utopian-moralistic)立场之上。卢卡奇对赫斯文章的评论之中指出，这些激进的黑格尔拥护者们试图通过将伦理价值作为未来知识基础这一构想恢复革命性理论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拒绝采纳黑格尔的具体探析和黑格尔与现状所做出的和解。

在晚年黑格尔的成熟作品中，他认为其构建的社会理论中“应然”在“实然”中实现。依据黑格尔的表述，如果马克思将“人类本质”看作是一种伦理理念，通过对“人类本质”的相对理性论证，哲学研究就可以在理论上对这一理念不做探究。如警察法庭一样，异化(Alienation)不仅是由黑格尔从理念(Ideal)中演绎出来的概念，还像跳蚤和麻疹的客观存在一样是实践生活中不合人意的事实。哲学理性(reason)对这些深切关乎人类幸福的事情所表现出的中立和不为所动，并非任意而为，而是表达了社会存在的本质。对抽象理念的要求是要对理念本身进行否定，而这种否定必然会被超越了抽象理念的客观性——即理性本身——所阻挠。黑格尔流派并没有被重构的唯心主义理论所打倒，而是预料到这一可能性并提前作出了反驳。

黑格尔对康德和抽象的伦理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驱动马克思致力于在社会事实的趋向中、理念的辩证性中和历史真实中为革命理论探寻理论基础。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早已给出了“马克思式”的路径：

与费希特(Fichte)的革命的乌托邦(Utopia)形成鲜明对比，黑格尔很早就在其著作中提出“理解其本质”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最早被提出是旨在对未来进行指导。他认为，将当下存在的事物理解为即刻成为和正在形成的事物是真正意义上历史辩证法(已经转化为哲学思想的历史辩证法)的起源。因为，当下存在的状态最为清晰地表明了结果与过程开端的统一，客观性的所有形式从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具体地表现为过程。在拒绝“应然”范畴和未来主义的乌托邦的前提之下，哲学对关于当下(辩证地理解)的

---

此持相反意见，参见其著作：Alienation, 第47页。可比较参照，艾伦·伍德(Allen Wood),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No. 3 (Spring 1972)。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历史性论辩的重要讨论可参见：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 “Y a-t-il une sociologie marxiste?”,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Gallimard, 1959)。



知识的关注恰好显现出唯一可能的现象学方法，以去了解可知的未来，在当下之中的趋向真正推动着当下，使其向未来前进。<sup>15</sup>

这更像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进一步说，更像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而非撰写《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的论述。《手稿》这一著作可能被看作为了解未知事物所采取的伦理学与社会经济学之间过渡性的路径。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尝试将政治哲学中的理念性概念重构为一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潜在性。他认为哲学和客观存在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客观存在自身的内部矛盾。这种新方法既不是纯粹思辨性也不是纯粹经验性的路径，而是在元批判之中综合了这两种路径。这种元批判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定位为客观存在发展过程中（real-in-process）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通过元批判这一概念，马克思将伦理理念相对地看作事物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此这一路径超越了空想的伦理主义学说。

举例来说，哲学性阐释构建的国家概念与马克思所旨在批判的真实存在的政府是截然相反的，但马克思并没有以此作为理论基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寄给鲁格（Ruge）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轻蔑地拒绝了采用这一路径：“到目前为止，哲学家们有着解决所有难题的方法，愚蠢的外部世界只需要张开嘴，那些绝对科学主义的烤乳鸽便会将自己送入虎口。”<sup>16</sup>马克思认为，应然层面的哲学演绎必须以真实存在的抗争作为探索的着手点，这种抗争印证了理念和客观存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新生代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世界自身运行的规律”，与证明客观真实的抗争中包含了与理性社会生活的概念相关的超验内容。“这一批判”，马克思写道，“因此可以从任何一种理论的和实践的观念形式出发，并由客观存在所固有的形式中发展出真实现状作为其应然的状态和最终的目标。”<sup>17</sup>

在这些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文章中，马克思可能被认为是力图从黑格尔学派的政治哲学中为革命开辟新的阵地。一个时代过去之后，恩格斯怀着敬佩之心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当黑格尔所主张“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而凡是合乎理性的也会在真实存在得到显现”时，对于马克思来说：

通过自己所主张的辩证法，黑格尔学派可以得出与其主张恰好相反的结论：所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得非理性的人类历史范围里的真实存在，都因其自身目的而成为了非

---

<sup>15</sup> 格奥尔格·卢卡奇 (Georg Lukács), “Moses Hess and the Problems of Idealistic Dialectics,” 在《Tactics and Ethics》一书中，由迈克尔根 (M. McCollgan) 翻译，利文斯通 (R. Livingstone) 校订 (New York: Harper&Row, 1975), 第 191 页。

<sup>16</sup>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Letter to Ruge,” 在《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一书中，由伊斯顿 (L. Easton) 和 K. Guddat 翻译并校订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第 213 页。

<sup>17</sup> 同上，关于理论-实践关联这一概念的详细内容请参见附录。

理性的存在，都预先就已包含了非理性的成分。；并且不管人类思想中的理性存在可能会与现实存在多大的矛盾，理性存在都必定会演化为现实。依照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全部规则，“凡是合乎理性的便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命题会将自身消解成另一个命题：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终将走向灭亡。<sup>18</sup>

总而言之，超越黑格尔的唯一途径即透彻地理解其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了这一点，并且通过此种路径他最终可以“由客观存在所固有的形式中发展出真实现状作为其应然的状态和最终的目标”。马克思在《手稿》中还主张，理性（事物本质）等同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具有社会性的中介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的个体性才能得以发展。“现实的客观存在”，即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是理性的“非理性形式”，而这种异化的存在必定会被调解并且最终会被革命所消灭。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便提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从资本主义形式中现存的冲突中推导出共产主义的潜在可能性。这种“应然的存在和目标”显现于存在的辩证法和作为理性需求、理性的方法论前提的本质之中。

作为一个实践哲学学者，马克思尝试重构理性的概念，以便将资本主义的异化作为理性的本质问题，并且这一问题终将通过历史活动被解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和早期哲学中确信无疑的是纯粹的社会偶然性与人类的苦难，并且将之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其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些归为人类的存在条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超验性的预设前提。这些预设哲学上理念性地被保有在理性的概念之中，马克思因此坚持主张“你不可以不了解的前提下就废止哲学理论。”<sup>19</sup>并以此反对“实际政党”中的社会改革者。

哲学中的“扬弃(Aufhebung)”这一概念同样也有其方法论的特性，本书中将会对此重点进行讨论。再次申明，我通过参照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对早期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理论体系进行解释和阐明。

## 第五节 元批判

在哈贝马斯(Habermas)使用“元批判(metacritique)”这一术语之后，“元批判”这一概念便广为人知。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之下，这一概念指的是针对“知识-构建旨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s)”有着本质性依赖的不同形式理论的哲学研究。<sup>20</sup>哈

---

<sup>18</sup> Frederick Engels, “Lu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8), 597-7. 正如马尔库斯在黑格尔的话语体系的阐述：“每一个存在的状态都必须被超越；它是一种被其内部潜在性所驱使的否定性的状态，并且渴望成为另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显现出它作为限制的否定性。”（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136页。）

<sup>19</sup>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50.

<sup>20</sup> 这一术语最初是康德在其早期批判著作中被使用，但是后来被错误地用。若要查阅哈贝马斯理论的总结

贝马斯依据旨趣的普遍性特征将其与日常的实践活动区分开,尽管这些旨趣同样属于社会领域的范畴。对于旨趣所起到决定作用的知识领域,它们是客观性的准超验性条件(quasi-transcendental conditions)。“准超验性”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描述,意指这些旨趣既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也不是纯粹自我的“世界-构成性”(world-constituting)假定。为了确认自然科学的认知价值和确证决定研究对象类型的技术控制中同类旨趣的根源,哈贝马斯需要这种概念,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概念避免落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深渊。

“元批判”在此意义上与卢卡奇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相似性的,因为它跨越了哲学思辨与社会解释之间的一般界限。尽管如此,实践哲学中的元批判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元批判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哈贝马斯的“知识-构成性”旨趣大多是带有类学特征的。哈贝马斯的“知识-构成性”旨趣因其普遍性特征而有类学特征。正因其普遍性特征,知识的(相对)真理存在于与旨趣的互动中。由此,以社会学具体性的减少为代价,还原主义被避免了。马克思和卢卡奇并未给出关于普遍类学旨趣的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元批判指向他们宣称在其中发现了理论抽象的具体性领域(a domain of concreteness)。将这一路径与怀特海(Whitehead)的主张进行比较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我认为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批判。它具有双重功能,第一重功能即通过指派给每个抽象概念具有相对性的抽象地位使之相互协调,第二重功能即通过与宇宙中更为具体的客观构成进行直接对比使这些抽象概念更加完整,由此促进更为完备的思想体系的形成。”<sup>21</sup>当然,对于马克思和卢卡奇而言,这种对抽象概念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发现思辨性的形而上学,而是为了实现被称为是哲学概念的“社会学进阶(sociological desublimation)”这一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路径方向的差异在于后者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实证经验主义(positive empiricism)。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概念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在康德哲学中,理性的形式属性能够尽可能完整地从事特定的内容中被抽象出来,这种特定的内容指的是理性主体得以进行实践理性的客体。康德证明,由于这些形式属性与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都存在关联,因此它们是所有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知识和行为的先验前提条件(priori preconditions)。每一个前提条件都服务于一种独特的价值,并指出通往客观现实的方向。

与之相反的是,马克思和卢卡奇反对康德哲学的文化思潮;他们追随着黑格尔的脚步,尝试解决在康德的理性形式主义范式中所出现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律背反难题。他们应当归功

---

性介绍,请参见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的附录。

<sup>21</sup>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entor, 1948), 88.

于黑格尔的是其所借鉴的辩证法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对立面双方得以在更高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中被调和。将整体性范畴应用于历史性既有的理性形式的研究中，为知识的不可还原性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哲学既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信仰旨趣的合理化工具，也不应当被看做是对生产关系的映射。哲学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之中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矛盾与冲突在假定社会的视域之下 (*under the horizon*) 被提升到观念的层次。并列的哲学概念和特定的社会背景都解释了哲学理论的困境与矛盾，还为通过社会行为来解决这些困境和矛盾指明了路径。

苏珊·巴克莫尔斯 (Susan Buck-Morss) 认为阿多诺 (Adorno) 的文化批判主义曾深受此方法论影响，正如阿多诺认为卢卡奇深受此方法论影响一样。她将卢卡奇的方法总结如下：

不同于将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原为生产经济条件的路径，卢卡奇认为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本质可以在智力现象本身中被发现...一旦这些思想家接受了将假定的社会存在作为特定真实的社会存在，他们就必须，面临可能无法被克服的非理性障碍（并且这种障碍促使康德提出了物自体的构想，因为这种障碍只有在从社会之中被消除的前提之下才能在理论上被消除）。相反地，如果理论家们能透过具体的现象看到本质，他们就会认识到哲学中二律背反的产生原因并非是理性的不足，而是现实的匮乏，并且理性自身试图在现实中自我挖掘与发现。<sup>22</sup>

一定程度上相同的分析同样可以适用于对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批判。巴克莫尔斯将社会学的还原主义与元批判进行比较。但是，找寻“在知识现象中的... [经济]条件的本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关键的核心要点需要在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的前提下去理解并进一步阐明。

费尔巴哈 (Feuerbach) 的核心论点即哲学是世俗化的宗教。他认为：“彼岸世界里宗教的对象也是客观世界中哲学的对象。”<sup>23</sup>当哲学将主体和理性以及思想等同时，它将“心灵 (spirit)”这一神学概念从抽象层面带到了现实。相类似地，作为思想客体 (object-of-thought) 的概念，由思想或者其所依循的理性法则所构成，是一种可与圣经

---

<sup>22</sup> Susan Buck-Morss, *The Origins of the Negative Dialect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26-7. 类似对社会学范畴进行“升华”或者“暗喻话”的哲学抽象的批判方法的应用参见: Pierre Bourdieu, *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Paris: Edition de Minuit, 1988).

<sup>23</sup> Ludwig Feuerbach, *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M. Vogel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6), 5.

创世纪相媲美的平凡又具有超验性的存在。这似乎是一个对哲学本质所进行的粗糙的还原。费尔巴哈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尝试在重构哲学之时超越这个基本命题。

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思想称之为“同一性哲学”，他认为其思想这是哲学传统发展的顶点。这种同一性所指的是思想 (thought) 与存在 (being) 的同一，以及理性 (reason) 与现实 (reality) 的同一。这种“同一性”富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费尔巴哈对该理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这一反驳是“正确并具有绝对性的观点”：“主张彼我之间的区分，主体与客体之间区分的观点。”<sup>24</sup>但是，尽管费尔巴哈拒绝接受“同一性哲学”，他却在另一个层次之上为该理论重构了其形式规则。

他从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开始进行对哲学的形式结构拆分。他认为这种“未来的哲学”将会保留这些形式的特征，但是会将这些特征与一种新的主体-客体的概念相关联起来。这是一种对基本哲学概念的元批判。通过在前述概念第一次被抽象出来的具体存在的领域中对它们进行重构，使得这些概念被相对化。

费尔巴哈首次重新定义了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并主张它们不仅仅只是概念，而是可被感知的、自然的客观存在。通过思想产生的统一性和在思想中实现的同一性是站不住脚和富有空想主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种“主体-客体 (subject-object)”的同一性可以通过感知和爱实现。费尔巴哈写道，“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在自我意识（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里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但这种统一性仅仅在人类的感性知觉中才是真理和实在。”<sup>25</sup>因此这一形式规则，即“主体-客体”的同一性，在否定了黑格尔的同一性理论的同时也有所借鉴。

这样做的结果是主体概念进一步扩大，涵盖了更多的内容，乃至将整个人类的范畴也纳入其中。这种扩展的主体概念由它一直以来对唯心主义的形式准则的遵循从而保留了“本体论上的困境 (ontological pathos)”。费尔巴哈明确地给出了他的结论，并对马克思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思想和存在的统一只有当人类被理解是该统一体的基础和主体时，才能拥有意义和真理。只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认识到了真实的客体，并且只有在思想不是它自身的主体而是真实存在的术语时，理念才得以与存在统一...从这一结论出发则可以得出下属范畴性的命令：不要渴望成为一个不同于人类个体的哲学家；做一个持续思考的人。不要像

---

<sup>24</sup> 同上，第 70 页。

<sup>25</sup> 同上，第 58 页。

一个与人类整体性割裂开来的哲学家一样进行哲学思考 ;像一个活着的和真实的存在进行思考 ,就如一个随时准备迎接世界海洋生机勃勃与新鲜浪潮的存在。在存在中进行思考 ,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进行思考 ,不要像一个孤独的单子、一个绝对的统治者和一个中立而超自然上帝一样在抽象的真空中进行思考。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你的观念都是存在与思想的统一。<sup>26</sup>

这正是马克思一开始在《手稿》中所提出的起始点。在《手稿》中,他尝试违背费尔巴哈所罗列的禁令,并为消除思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付诸一种英雄式的努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现实拥有一个基础,而科学拥有另一个基础,这是一种先验的谬误。”<sup>27</sup>在该文本中,马克思较多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其观点,这表明了他在此议题上的个人主张。“我的普遍意识是生命形式属于真正共同体的人的唯一的理论形式,尽管当下这种普遍意识是一种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抽象形式,并与现实生活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整体意识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理论性存在。”<sup>28</sup>

然而,与费尔巴哈相比,马克思是一个更为优秀的辩证学家和更为缜密的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保持哲学同一性的一般形式,而是希望创造主体概念与客体概念的人类学上的转机。他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更多的营养,旨在实现比费尔巴哈更富有野心的目标。马克思依循了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即主张“主-客体”的统一体应通过主体作为客体的真实构造来进行把握。并且,如黑格尔一样,他试图去避免费希特学派(Fichteian)所主张的利用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性概念进而将客体还原为主体的。他还赞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提出的观点,即主客体之间的关联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换句话说,他接受了卢卡奇所描述的“‘黑格尔’的计划:将绝对事物和其哲学目标视为结果(result),这一计划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同样有效,即便它有着不同的关于知识的目标,并且对其有着更深的关切,同样有效的原因是其将辩证过程视为与历史进程视为同一的。”<sup>29</sup>因此,马克思保留的形式原则比费尔巴哈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吸收后的成果更为复杂和丰富。

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做出了他的计划,因此很显然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哲学的

---

<sup>26</sup>同上,第67页。针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请参见:Shlomo Avineri,“The Hegelian Origin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 in Marx’s Socialism, 3-4.

<sup>27</sup>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163.

<sup>28</sup> 同上,第158页。

<sup>29</sup>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0页。可比较卢卡奇另一处表述,“Moses Hess and the Problems of Idealist Dialectics,” 214-5

改革”（费尔巴哈的措辞），而是一种“扬弃（Aufhebung）”，即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乃至普遍意义上的哲学的超越。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展开批判，旨在论证作为绝对知识的理性概念仍是一种神学上克服社会异化的思想尝试。“理性的秩序（order des raisons）”必将被颠倒：当且仅当异化在现实生活中被消灭时，理性的异化才得以可能。因此《手稿》不只是对理性概念进行哲学重构从而达到其目的。革命成为一系列新思想的基础，通过在生活和社群中挖掘理性，克服思想和生活、思想者和社会的对立。在保留黑格尔思想形式结构的基础之上注入新的内容，实践哲学的领域由此开辟。

### 第六节 哲学的终结<sup>30</sup>

马克思和卢卡奇所采用路径的独特之处，并将其区别于康德和黑格尔的，是他们认为传统哲学和社会现实的二律背反是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的“元批判”具有双重含义。马克思和卢卡奇不仅尝试将哲学抽象联系到社会生活，并提出其发现了传统哲学的抽象方法中内在的局限性。由于传统哲学理论默认社会秩序的异化基础根植于客观存在的本质之中，故得出了二律背反只能在思辨中得到解决的结论，并据此进行研究和寻求解决方法。传统哲学的标准由此反映了马克思和卢卡奇挑战的社会变化的内在局限。他们认为，二律背反需要在之前的哲学先驱们未曾想到的社会变革的前提下才能被解决。

然而，马克思和卢卡奇并非对哲学进行了单纯的否定。事实上，他们着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理性概念和其具体的社会产物的张力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尽管传统哲学有着其局限性，但它能够挖掘出社会潜力，即便这种挖掘只能存在于理论形式中。现在的问题在于面向社会变革，并在新的语境之下重新构建哲学理论。马尔库塞如此总结道：“理性的哲学构建被理性社会的创造所取代。关于一个更好的世界与真实存在（true Being）的哲学理念被融入到人类所为之奋斗的实践目标中，并以人类实践的形式存在着。”<sup>31</sup>

总之，正如本书中所采之意，元批判的方法由具有辩证相对性的哲学形式和社会内容所构成，也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和卢卡奇并没有在既有的历史传统之中构建学说，而是将传统视为已被完成，进而从“外部”对其进行研究，即将传统看作是宏大的、行为可进行干预的社会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在这种视角之下，而不是仅仅出于实用主义急迫性，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十一篇文章中所写语句之意：“哲学家只能通过各种方法去诠释(*interpreted*)世界；最终目的在与改变(*change*)它。”<sup>32</sup>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有着较为含混阐释的理论-实践的关系理论有着相当确定

<sup>30</sup> 本节的许多想法归得益于与 Gerald Doppelt 的讨论。

<sup>31</sup>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142.

<sup>32</sup> Karl Marx, “These on Feuerbach,” in *Writings of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402.

的含义。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澄清其含义。因为本人也正在这一传统中著书立说，我将沿用马克思和卢卡奇对“哲学(philosophy)”、“理论(theory)”、“实践(practice)”等术语以及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哲学的终结(the realization of philosophy)”等表述的构建。在以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之前，我会跳出这一框架去预设一些反驳。我将把这些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哲学的终结”等表述具有潜在挑战性的意见以问题的形式提出。

1. 马克思和卢卡奇声称他们在“终结(realizing)”哲学，将理论投入实践。这一论断与将理论“应用(apply)”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何区别？

2. 马克思和卢卡奇声称哲学传统已经终结，这似乎意味着他们本身并未对该传统作出贡献。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历史与阶级意识》毫无疑问是哲学著作。他们究竟是不是哲学家？如果是，他们如何在其所主张的哲学已经终结的前提下进行哲学阐述？<sup>33</sup>

3. 马克思和卢卡奇似乎在说只有革命才能“解决(solve)”哲学问题，但是他们仍在革命发生之前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这难道不是意味着革命与哲学问题解决终究并不相关吗？

这些问题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特定术语的含糊其辞。当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被理解时，马克思和卢卡奇的主张就不像表面乍一看那么激进了。最主要的困境源于“哲学(philosophy)”和“理论(theory)”这些概念的含糊。因此，我将就此议题出发进行阐述。

通常，“哲学”指对某一学科、实践或文化的基本预设和概念进行反思的活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和卢卡奇很明显地仍在从事哲学活动，他们也不会对此有所否认。但对于他们而言，“哲学”还意味着一个自古希腊到黑格尔所共有的特定历史传统。他们认为这一传统已经“结束”，如果说他们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这一传统，他们会对此予以否认。尽管特定范式的概念和方法发生了变革与创新，但它们仍是传统整体的构成要素，并且贯穿其始终。是这一范式被穷尽了，而非思辨活动的本身。

早期的马克思和卢卡奇、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以及德里达(Derrida)都提出过哲学传统整体的普遍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宣布它的终结。思考仍在继续，并且它确实没有原创性的概念可以去取代旧的概念。但是哲学家与这些概念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单纯的；哲学的“死亡(death)”正是指思想家们逐渐意识到产生这些概念的文化系统的历史局限性。

---

<sup>33</sup> Timothy Hall 就论证循环的困境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些理论如何对自身可行性做出解释……形而上学批判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批判的前提性的特质自身就是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前提上。站在哲学之外的立场时，这一立场下的规范前提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 Timothy Hall, “The Metacritique of Philosophy: Marx, Lukács & Adorno,” 未出版的文稿，第2页。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护者，这样的意识具有特定的社会性。他们追溯哲学的永恒真理、常量和范式的源头，直到一个正处在消亡过程中的社会世界。《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处非常明确的宣言表明了这一立场。

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有着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却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发展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灭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点也不意外。<sup>34</sup>

如果我们接受了“哲学”因与传统的阶级社会相联系所有的局限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含义更广的词汇，以指代对基本预设（“哲学”只是其中一瞬）进行思考的综合性过程。这个含义更广词汇，就是“理论”。现在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理论，一种类型是传统哲学，一种类型是马克思所构建的理论。这就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一篇知名论文<sup>35</sup>中提出的关于“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一样，马克思和卢卡奇声称传统理论已被一种新的批判理论所取代。他们不是说哲学应该被抛弃，或者简单地在通常意义上被“应用”。因此，关键点并不是要放弃哲学思考，而是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思考。

这种新的哲学思考与旧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在于，相对于哲学传统所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旧的哲学思考把哲学传统视作为当然的前提。举例来说，批判理论并未接受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这一二律背反的永恒必然性，而是指出这一二律背反只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批判理论仍处理着哲学阐释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概念问题，但是它认为该二律背反所对应的反面社会背景视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对抽象或“纯粹（pure）”理论的批判应在这一语境下理解。同样地，马克思和卢卡奇并不是拒绝对具体经验的进行概念抽象，而是拒绝哲学自身概念脱离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抽象过程。哲学将其概念视为建立在关于自然或人类状况的永恒事实上。但是一旦如此理解，这些概念的社会背景便被阻隔了，人类活动在解决其中所蕴含的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

---

<sup>34</sup>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9), 29.

<sup>35</sup> Mar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O’Connell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角色也变得难以想象。因此，比起回到经验，马克思和卢卡奇更强调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可变的社会背景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现在，我们回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二律背反的举例之中，进一步阐释实践是如何对理论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的。柏拉图（Plato）提出他之后的哲学一直探究的问题。《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的下等阶层永远追求个人利益，由此不配统治社会。柏拉图的护国者通过完全丧失个人生活，从而得以有权力统治国家；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何人。对于希腊人，舍弃家庭就是舍弃私人领域，进而舍弃私人利益。二律背反在此不言自明。

这一二律背反在不同于柏拉图的哲学家卢梭（Rousseau）身上，并没有消失。他将普遍意志划分为全体意志与私人利益的对立。他没有将特定阶级视为意志的负担者，但也将二律背反问题投射于个人。灵魂的分裂要求公民以其“德行（virtue）”抵御单纯的贪欲。甚至主张“个人罪恶是公共利益”的曼德维尔（Mandeville），也默认在追求个人利益中的个人意图与通过其矛盾对立面实现的公共利益没有关系。罗尔斯（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著名的“原初状态”之概念，有着与柏拉图所作相同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哈贝马斯在严格区分语言的交流使用和策略使用中，也同样贯穿着这一二律背反。

对于马克思，这种思维局限十分清晰。这一二律背反背后未经质疑的前提是生产工具的私有化和因此产生的社会成员的对立。因为社群有着与这些对立的个人利益的单纯之和不同的需要，公共利益得以与私人利益共生。但是如果历史条件导致生产工具的私有化可以被理性监管的经济和代表全体社群利益的国家所取代呢？当然，某种形式上的“个人”利益仍会存在，但是它们不会与群体的公共利益产生对立关系。不再是为了公共利益奉献，因而需要施行德行上的独裁或者完全摒弃个人利益，二者将处于和谐之中，一方利益的自由发展都是对双方利益的自由发展的支持。传统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构建将不再适用，至少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论证的并非是马克思对社会的改造行之有效——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是曾经有人设想过这一真实的可能，即社会活动在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是纯粹的理论性角色。社会活动被赋予的新角色正是哲学的“终结”这一概念所暗含的。以前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理想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终结了。终结的过程需要激进的社会变化，而不是像柏拉图的乌托邦、卢梭的“德行”或者曼德维尔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纯粹的概念媒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哲学思考不需要等待革命的到来。哲学思考总是可以超越现有的成就并面向理想的结果进行。这对于马克思和柏拉图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的

差异，预测性思考也可能大不相同。尽管柏拉图可以想象女人作为他的理想国的护国者，他仍认为废弃奴隶制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经做出奇妙的想象，如果工具可以不借人力而工作，奴隶制就可以被废弃了。在马克思著书的时代，这一远古的天真幻想已成为迫近实现的可能性。基于历史形势的变化，他为哲学构想了一个与之前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的实践背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该本应由革命实际解决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们确实坚持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抗争，工人阶级才能挑战千年以来阶级文化的主导这一前提，从而才能提供针对老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案<sup>36</sup>。之后的章节会就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

<sup>36</sup> Lukács,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09.